

社会预警系统与心理学

王二平 张本波 陈毅文 史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首先探讨了对社会不稳定因素预警的需要,以及社会预警系统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的意义。社会预警系统是一种系统的社会态度调查网络,通过对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态度调查,预见其可能的行为反应,将不稳定事件化解于未然。然后,介绍了国外承担社会预警职能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实践。最后,讨论了社会预警研究两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态度与行为反应的关系,调查抽样问题。

关键词 社会预警系统, 社会不稳定事件, 社会态度调查。

分类号 B849:C91

1 经济和社会发展呼唤建立社会预警系统

2002年与2003年之交,不期而遇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中国部分地区蔓延,使公众陷于恐慌之中。政府为控制疫情不断调整应对措施,并试图平息社会恐慌。然而一些政策和应对措施的失误,又加剧了这种恐慌。此时此刻,官员和公众都意识到,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一时间,许多学者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预警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需要预警和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大规模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各种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腐败现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还有国际交往和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文化冲突等。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正在转型,全社会各阶层人的利益都在重新分配,必然产生和积蓄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回顾过去,除了许多小规模的地方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外,我国还发生了多起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社会不稳定事件——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仓促应对总难免失误。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国家行政部门制定公共政策和解决问题决策的过程——首先觉察到待解决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解决问题方案,再实施政策和决策。当遇到阻力时,又不得不逐步调整政策,改变应对措施。这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做法,虽然有效,但难以避免损失。例如,1993年以来的三峡库区移民工作,1998年取消国家机关班车的措施,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等等。有些大的政策失误,损失往往很难挽回。这方面我们的教训也不少。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同样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公共政策,不同个体由于利益得失不同,必然持不同的社会态度。人们的社会态度指引其社会行为。了解各社会阶层对公共政策的态度,就可以预见其可能采取的应对行动。如果在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过程的前端增加一个了解公众社会态度的环节,公共政策制定和解决问题的决策就能够有的放矢,可接受性就会更高,可以大大减少政策和决策失误。这就是“曲突徙薪”的做法。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态度调查称作社会预警系

收稿日期: 2003-06-20

通讯作者: 王二平, email: wangep@psych.ac.cn

统。有了系统的社会态度调查，国家不仅对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为敏感，还可以将各种社会不稳定事件化解于未然。

国家行政部门制定管理公众的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涉及许多心理问题，如不同社会阶层人的利益和需求，不同群体对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态度，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可接受性等。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水平：个体水平、群体和组织水平、社会水平。我国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水平，如认知过程、个性特征、身心健康等。近年来，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有了一些群体水平和组织水平的研究，如群体规范、工作团队建设、组织学习等。然而，关于社会水平的研究，我们几乎没有。这种状况对于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很不利。许多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行政部门想不到请教心理学家；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行政部门和公众想不到找心理学家帮助解决。如果心理学研究不能为国家公共政策服务，心理学就不能赢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在我国也难以得到迅速发展。

2 国外社会预警系统的研究实践

了解国外的社会预警系统可以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借鉴意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社会预警系统。例如，美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就开展定期的社会状况调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署（Social and Cultural Planning Office）在 60 年代也倡议其成员国成立专门机构，加强社会状况的监测，并逐步被各国政府所接受。目前多数欧盟国家都定期进行社会变动调查，以了解民意、服务于公共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这里简要介绍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SR）和英国全国社会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CSR）的研究实践。

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是世界最大、美国历史最长的综合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社会研究所是在 Lewin 于 1939 年建立的团体动力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下辖 4 个研究分支：调查研究中心，团体动力研究中心，政治研究中心，以及人口研究中心。社会研究所主要承担美国政府和大型私营企业委托的调查研究项目，每年大致维持在 50 个左右的研究项目，2002 年的研究预算达 3 300 万美元。社会研究所的许多研究项目为长期追踪调查。以下是它的一些重要调查研究项目。

消费者态度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Attitudes），自 1946 年起每月 1 次^[1]；

全国选举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自 1948 年起每 2 年 1 次^[2]；

美国人家收入动态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自 1968 年起每年 1 次^[3]；

把握未来——青年人调查（Monitor the Future – American Youths Survey），自 1975 年起每年 1 次^[4]；

美国人生活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Life），主要调查非洲裔美国人的社会态度，自 1979 年起每年 1 次^[5]。911 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后，社会研究所又于 2003 年 6 月启动了阿拉伯裔美国人调查^[6]；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自 1989 年起每 5 年 1 次^[7]；

健康与退休生活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自 1992 年起每 2 年 1 次^[8]。

英国全国社会研究中心是英国最主要的非营利综合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主要承担英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委托的调查研究项目。英国政府通过一些民间基金资助全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全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项目为长期追踪调查。主要的调查项目有：

家庭支出调查（the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自 1957 年起每年 1 次^[9]；

英国人选举研究（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Studies），起初由 Essex 大学，后由社会研究全国中心和牛津 Nuffield 学院联合主持，自 1964 年起每个选举年 1 次^[10]；

劳动力调查（The Labor Force Survey），由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主持，全国社会研究中心参与，1973 年首次开展，自 1983 年起每年 1 次，1992 年以后每季度 1 次^[11]；

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urvey），自 1983 年起大致每年 1 次^[12]；

工作场所雇佣关系调查（Workplace Employment Relations Survey），自 1980 年起大致 4-6 年 1 次^[13]；

英国人犯罪调查 (British Crime Survey), 英国最大的调查项目, 自 1982 年起大致每两年 1 次^[14]。

从以上介绍中, 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2.1 每项社会预警研究都起因于特定的社会不稳定事件

社会研究所最早启动的消费者态度调查, 是针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展的。又如,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引发了社会研究所对美国黑人的调查研究; 根据美国人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解, 社会研究所最近又启动了对美籍阿拉伯人的调查。随着对特定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理解深化, 又逐渐发现与其相关联的其他社会因素, 研究的问题便不断拓展开来。

2.2 社会预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国家行政部门而非媒体和公众

社会态度调查的目标是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解决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建议和技术支持。由于调查内容都是社会敏感问题, 国家行政部门或所属的研究机构显然不便于直接操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商业性调查机构也不应介入。因此, 承担社会预警职能的只能是有国家支持背景的科学研究机构。为服从社会预警的目标, 调查研究项目名称的表面效度较低; 调查内容尽量避免暗示性或某种倾向性; 研究结果一般不公开发表或滞后若干年发表; 调查研究活动在宣传上往往低调处理。

2.3 社会预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任何社会不稳定事件都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诱因和过程。单一学科的研究难以深入揭示它们。从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实践来看, 消费者态度研究最初以心理学家为主。在设计分析方法和解释调查结果时产生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需要, 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逐渐参与进来。此后, 每个调查项目都需要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数学的学者联合研究。社会研究所的研究队伍常年维持在 100 多人。大多数为客座研究人员和博士后流动人员。他们中有来自密西根大学各院系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统计学家、数学家等。每个调查项目从立项、调查问题设计、统计技术选择到结果分析, 都有各学科专业的学者参与。显然, 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学者对问题的认识和操作不可能相同, 但在对问题的实际社会意义上是容易达成共识的。这就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

2.4 社会预警需要长期的研究积累

一项设计良好的调查, 除了能解决已提出的问题外, 还能发现新的问题, 于是提出新的调查要求。已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没有消除, 就有继续监测、继续研究的必要。长期的追踪调查能更深刻地认识问题, 发现更多的新问题。社会研究所的消费者态度调查将多年的消费者经济信心与经济景气曲线比较发现, 消费者的经济信心变化对经济景气有 3 周到 6 个月的提前量, 据此确认消费者的经济信心是经济景气的良好预警源。

2.5 社会预警有向世界范围推广的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冲突, 都会反映在人们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转变上。因此, 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形势的影响因素也具有了全球性的趋势。而我们也观察到, 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社会预警职能已从美国本国范围推广到国际社会。20 世纪末的东欧剧变, 其中恐怕也有它“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功劳。

3 社会预警系统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这里探讨的方法论问题, 主要指社会调查中涉及的社会心理学问题。有些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 却有着复杂的理论困惑和研究要求; 有些已成为研究者共识的问题, 在实践中却往往被忽视。

3.1 行为反应与社会态度的对应关系

人的社会态度指引其行为。通过了解社会态度应当能预测人的行为。这个问题看似容易, 其实不然。社会心理学研究早就证明, 行为反应可能与社会态度不一致。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这种不一致给予以下几种

解释^[15]。

具体的行为与基本的态度不一定相符。一般而言,态度是相对稳定的。态度的对象越是涉及主体的基本价值观念,态度就越稳定。相对而言,行为总是具体的,工具性的。越是边缘性的行为,行为变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在特定情境下,不排除具体的权宜行为与稳定的基本态度不一致。根据这一认识,调查问题的设计应当概括到何种程度,是应当针对一般的社会事物,还是应当针对具体的行为反应,都是需要探讨的。

迫于外部压力,表达的可能并非真实态度。这种外部压力,可能是对手的胁迫,也可能是群体规范的约束。在态度调查中,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反应就是一种迫于规范压力而表达非真实态度的现象。当人们回答有社会评价意义的问题时,往往倾向于与社会评价的方向保持一致,以塑造自己亲社会、好公民的形象,或者避免被排斥、被打击。社会预警调查往往涉及很多敏感的社会问题。根据这一认识,调查情境和调查问题不应给被调查者造成任何压力;提问的问题不应当有任何暗示和诱导。

态度的认知成分与情绪成分冲突导致行为与态度不一致。设想人们对贪污罪深恶痛绝。但是如果得知自己最亲密的亲人或朋友犯有贪污罪时,是检举他,还是包庇他?这就陷入态度的认知成分与情绪成分的冲突。根据这一认识,调查提问的表述不应渲染任何情绪;问题不应激起被调查者强烈的情绪反应。

3.2 调查抽样的代表性

调查是心理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研究者们开展的调查研究很多。有种倾向值得注意——许多调查研究片面追求抽样规模。似乎抽样规模越大,结论就越可靠。但是,这样的调查却不注意抽样的代表性。其实,这样的调查并非完全随机抽样,而是方便抽样——即怎样容易获得被调查者就怎样做。这种抽样的代表性是可疑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调查研究最主要的目标是根据样本描述来推断总体的特征。抽样规模大并不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设想有这样一项样本上万的消费行为调查,但它的样本都抽自城市,或者都抽自南方,怎么能使人相信该调查结果可以解释全国的消费者?还有一种现象,许多调查研究报告在介绍抽样结果时只说明获得多少有效样本,却不说明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设想一项研究向男女成人调查婚姻质量,而所有男性被调查者都回避回答问题,结果收回的问卷只有女性成人的。无论如何,这种调查结果对总体的描述和预测都是不成立的。

样本的代表性(或抽样误差)主要取决于抽样方案的设计。最佳的抽样设计要求在一定的误差限度内使成本最小,或在一定成本下使误差达到容许的程度。心理学研究早已揭示,对于异质性较高的总体,简单的完全随机抽样难以保证抽样的代表性,而合理地利用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抽样误差^[16]。即将总体按照一个或几个辅助变量(如总体的性别、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地域分布等),先分成几个层,由每层独立取出样本,再综合每层的调查结果,得到对总体的推断。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民族、语言、习俗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较大,在设计全国性抽样框时,往往需要运用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PPS 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ing)等多种抽样方法相结合的复合抽样,才能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http://www.sca.isr.umich.edu/documents.php?c=r>
[2] <http://www.umich.edu/80/~nes/>
[3] <http://www.isr.umich.edu/src/psid/>
[4] <http://monitoringthefuture.org/>
[5] <http://www.regd.isr.umich.edu/prba/nsaa.htm>
[6] <http://www.isr.umich.edu/news/arab-amer/index.html>

- [7] <http://wvs.isr.umich.edu/>
- [8] <http://www.umich.edu/~hrswww/>
- [9] <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fesAbstract.asp>
- [10] <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besAbstract.asp>
- [11] <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lfsAbstract.asp>
- [12] <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snDescription.asp?sn=4131&catalogue=&descform=0>
- [13] <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werAbstract.asp>
- [14] <http://www.data-archive.ac.uk/findingData/bcrsAbstract.asp>
- [15] Wicker A W. Attitude versus ac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verbal and overt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attitude objec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9, (1): 41~78
- [16] 谢邦昌. 抽样调查的理论及其应用方法.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171~214

The Role of Psychology to Social Alarming System

Wang Erping, Zhang Benbo, Chen Yiwen, Shi Wei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first the need of social alarming to instable factors for a socie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alarming system to make public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Social alarming system refers to a social attitude survey network by which social crisis events can be predicted and ceased. The next part of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urveys of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last part, the authors highlight two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ssue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and actions, and the sampling.

Key words: social alarming system, crisis events, social attitude survey.